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成果丛书

Publication Series: MOE Supported Projects of Key Research Institute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Universities

语言文学类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不同母语背景的汉语学习者 词语混淆分布特征及其成因研究

张 博 等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成果丛书

不同母语背景的汉语学习者 词语混淆分布特征及其成因研究

张 博 等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不同母语背景的汉语学习者词语混淆分布特征及其成因研究 / 张博等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1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成果丛书)

ISBN 978-7-301-27574-0

I. ①不… II. ①张… III. ①汉语—词语—研究 IV. ①H1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29472 号

- | | |
|-------|--|
| 书 名 | 不同母语背景的汉语学习者词语混淆分布特征及其成因研究
BUTONG MUYU BEIJING DE HANYU XUEXIZHE CIYU HUNXIAO
FENBU TEZHENG JIQI CHENGYIN YANJIU |
| 著作责任者 | 张 博 等著 |
| 责任编辑 | 欧慧英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301-27574-0 |
| 出版发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 网 址 |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电子邮箱 | zpup@pup.cn |
| 电 话 |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8 |
| 印 刷 者 | 北京鑫海金澳胶印有限公司 |
| 经 销 者 | 新华书店 |
| | 73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32 印张 539 千字 |
| |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80.00 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总 序

崔希亮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越来越大,汉语也逐渐成为地区性或者国际性语言,因此带来了学习汉语的热潮。汉语热的背后是中国热,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中国经济、中国政治、中国历史、中国武术甚至中医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习者和研究者。语言是学习中国文化、了解中国社会的桥梁。语言学习是有捷径的,方法对了可谓事半功倍。对于很多国家的学习者来说,汉语是一门很难学的语言。原因有三:第一,从类型学上看,汉语属于孤立语,语法形态不发达,有声调,对于其他语言背景的人来说习得较为困难;第二,汉语的书写系统不是字母文字,汉字是学习中的瓶颈,汉字难学使得很多学习者望而却步;第三,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历史比较短,很多问题没有研究清楚,我们对汉语本身、对如何教、对学生的学习心理都缺乏足够的研究。基础研究的薄弱导致我们的教材、教学法、教学手段无法满足学习者的要求。在汉语国际推广的形势下,我们应该多研究一些实际问题,从大处着眼,从细微处着手。

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之一,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研究的核心基础,在海内外汉语教学与研究领域有广泛的影响。中心自成立以来,承担了很多重要的科研项目,这些项目有的已经结项,有的还在进行当中。这批科研项目汇聚了北京语言大学以及海内外学者的研究力量,其成果的发表必将在学术界产生重要的影响,从而推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北京大学出版社愿意出版这套系列丛书,作为这套丛书的作者之一,我感到十分高兴。

对外汉语教学研究,或者称作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研究,是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这个学科的主要学术基础是汉语语言学、普通语言学理论、教学法、教学理论以及认知科学。对外汉语研究系列丛书的主

2 不同母语背景的汉语学习者词语混淆分布特征及其成因研究

要著者都是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的驻所研究人员,他们的学科背景并不相同,有做语言学的,有做认知心理学的,有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其中做语言学的有专攻语法学的,有专攻词汇学的,有专攻第二语言习得的,有专攻语言测量学的。尽管大家的学科背景不同,但是在合作研究的过程中互相尊重,取长补短,在合作中互相学习。课题组中也包括了一些来自其他领域的合作者和本中心的研究生。对外汉语教学是个新兴学科,也是一个交叉学科,在这个领域很多问题涉及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以及一些相关的学科,因此这样的学术研究背景多样化的组合是比较合理的。当然不同的学者有自己的学术取向和研究思路,不能要求大家齐步走。

基地研究课题的选择是经过专家论证的,内容涵盖了对外汉语教学亟需解决的许多基本问题。例如赵金铭教授负责的《基于中介语语料库的汉语句法研究》,主要关注对外汉语教学中一些带有普遍性的语法问题。为了避免分析过程中的主观随意性,这个课题的研究素材来自于北京语言大学开发的“汉语中介语语料库”。张旺熹教授负责的《汉语教学参考语法研究》旨在为汉语教师和学习者提供一部系统完善的辅助工具书。我负责的《日韩学生汉语学习与认知专题研究》把关注的焦点放在日本和韩国学习者身上,因为他们目前是最大的学习群体。日本和韩国都属于汉字文化圈,日语和韩国语中都有大量的汉语借词,然而这两种语言与汉语属于不同的类型,它们都属于黏着语,因而日韩学习者有很多共性的问题。宋柔教授负责的《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多媒体资源库及检索分析工具研究》则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上解决教学资源的问题,目的是为对外汉语教学提供先进的技术手段。张博教授负责的《基于中介语语料库的汉语词汇专题研究》从词汇学的角度分析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词汇问题,研究易混词、多义词、同义词、反义词偏误现象,为词典编写、教材编写和课堂词汇教学提供参考依据。另外,目前还在研究过程中的项目有孙德金教授负责的《欧美学生汉语语法学习与认知专题研究》、张凯教授负责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能力标准》、王建勤教授负责的《全球文化竞争背景下的汉语国际推广策略研究》、高立群教授负责的《基于教学实验的对外汉语教师教学认知能力及培训模式研究》和张劲松教授主持的《面向外国学生的计算机辅助汉语正音系统研究》,这些都是关系到汉语教学瓶颈问题的研究题目。对外汉语研究中心每年都会组织新的重大研究课题,我相信,通过努力,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在广度

和深度上都会不断向前推进。北京大学出版社与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的这项合作出版计划能够惠及最广大的研究者和学习者,能够为汉语的国际推广事业添砖加瓦,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2008 年 12 月

前言

词汇错误在二语学习者各类言语错误中比重最高,以往研究有多种统计数据证明了这一点(详见张博,2008);而在各种类型的词汇错误中,词语混淆又是最为常见的。北京语言大学“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崔希亮教授主持研发)把词汇错误分为“错词”“缺词”“多词”“离合词错误”和“外文词”5类,另有个别“词处理存疑”。我们根据该库“词错误汇总”数据^①进行计算,可以看到,在5种词汇错误中,“错词”的数量最大,占词汇错误总数的53.75%,超过其他4类词汇错误的总和。尽管“错词”中有个别结构性错误(如用错语素或语素序不当),但绝大多数属于词语混用,即当用甲词而误用乙词,(或)当用乙词而误用甲词。例如:

现在社会,科学多么发展,我们从科学中能得出答案。(当用“发达”)

香港是个很漂亮的地方,而且在世界上是最发展的城市之一。(当用“发达”)

我想“代沟”是在社会发达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普遍的现象。(当用“发展”)

现在,科学发达很快,一定会发明替代化肥和农药的东西。(当用“发展”)

如何看待词语混用这种词汇错误的性质呢? James(1998/2001: 144—154)在讨论词汇错误分类时,首先区分了形式错误和语义错误,在词汇的语义错误中,又分出“意义关系混淆”(confusion of sense relations)和“搭配错误”两个次类。从理论上说,这两类错误的区别应当是,“意义关系混淆”并不违反搭配规则,只是词义不合,例如,“大约一分钟以后,我的朋友拿着行李跳下楼来(当用‘跑’)”。“搭配

^① 各类词汇错误的频次分别为:错词 40882;缺词 17039;多词 17945;离合词错误 86;外文词 16;词处理存疑 95。6类词汇错误合计为 76063 次。

错误”在意义上没有问题,只是搭配不当,即相关词语习惯上不能共现。例如,“我眼中的太阳光仿佛一万支箭射过来,使我张不开眼睛来(当用‘睁’)”。可是在词汇错误的实际分析中,我们发现“意义关系混淆”与“搭配错误”并不能截然分开,在很多情况下,误用词不仅在意义上与语境不合,而且在组合关系上也不能与其前后的词语搭配共现。例如,“我觉得从小长大的一对男女最有能力克服结婚生活的种种困难(当用‘婚姻’)”中的“结婚”就兼有“意义关系混淆”和“搭配错误”两方面的问题,前举“发展”“发达”的混用也是如此。因此,我们主张把“意义关系混淆”视为某些“搭配错误”的心理根源,把某些“搭配错误”视为“意义关系混淆”的外在表现^①。在指称使用层面的错误替代时不刻意区分是“意义关系混淆”还是“搭配错误”,通常称为“词语误用/混用”;从心理归因的角度提及这类词汇错误时则多称为“词语混淆”。

以往研究认为,第二语言学习者之所以发生词语混淆主要是受到词语语义关系的影响。因此,James(1998/2001:151)将此类词汇错误称为“意义关系的混淆”,并归纳为4种类型:a.上位词误代下位词(*The flowers had a special * smell (✓scent/✓perfume).*);b.下位词误代上位词(*The * colonels (officers) live in the castle.*);c.不恰当地使用同位词(*She is my * nephew.*);d.误用近义词(*... a * regretful (✓penitent/✓contrite) criminal or sinner...*)。Agustín Llach(2011:124)将词语混淆命名为“语义混淆”(semantic confusion),以此指“语义相关的词语的混淆,换句话说,两个词由于它们语义相似而混淆,即它们有相似的意义但功能不同”(如*My bedroom is * great (✓huge/✓big).*)。

通过James(1998/2001)和Agustín Llach(2011)等对于词语混淆现象的命名、界说及给出的例证可以看出,以往研究多将导致二语学习者词语混淆的原因归结为目的语词在语义上的相近或相关。也就是说,在其看来,词语混淆是一种语内错误(intralingual errors)而不是语际错误(interlingual errors)。这样判定词语混淆的来源是否符合二语学习者词语混淆的实际?怎样证明二语学习者的词语混淆是受目的语词的语义关

① 这里之所以用“某些”对“搭配错误”进行限定,是因为我们在讨论词语混淆问题时排除了两类词语误用,一是因词汇量不足导致的常用词替代,二是源于母语特定词组直译的词语误用(如“打足球”中的“打”)。(详见张博,2013)

系的影响?除了语义因素以外,还有没有其他词汇特征会导致或加重学习者的词语混淆?目的语词语混淆是否与母语全然无关?如果有关,母语的哪些词汇知识会导致目的语词语混淆?各种母语影响因素的作用力如何?我们认为,要想解答这些问题,需要基于大规模中介语语料库,对不同母语背景的二语学习者词语混淆的分布状况进行全面调查和对比分析,弄清哪些是各种(或多种)母语背景学习者共通性的易混淆词,哪些是单一(或少数)母语背景学习者的特异性易混淆词。因为,从理论上推测,不同学习群体的共通性词语混淆主要与目的语词语特征有关,而特定学习群体的特异性词语混淆则可能来自母语词汇知识的干扰。只有探明不同母语的二语学习者词语混淆的分布状况和特征,才能为分析目的语和母语影响因素找准方向,从而客观全面地揭示二语学习者词语混淆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力。

一 研究视角与目标

1.1 研究视角

在第二语言教学研究领域,早期的对比分析法提出学习者的二语偏误主要是母语知识负迁移造成的。随着偏误分析的兴起,学者们日益发现不少偏误类型在不同母语背景学习者的二语表达中都会出现,母语的迁移作用到底有多大因之受到质疑。为了验证母语的迁移作用,研究者们开始比较不同母语背景的学习者习得目的语某一语言项目的情况,尤其关注其偏误表现有何异同。其研究思路基于这样一种理论预测——在二语习得的过程中,如果某种偏误只出现于某一母语背景学习者的目的语中,就可以证明这类偏误主要受到学习者母语迁移的作用。然而,这类对比研究主要集中于不同母语背景学习者二语语法项目的习得规律和偏误分布(例如 Hu & Liu(2007)、Marsden(2008)、马志刚(2012)等),对不同母语背景学习者词汇偏误进行对比研究的成果则十分罕见,之前我们所见只有 Agustín Llach et al. (2005)。

Agustín Llach et al. (2005)以 71 名母语为西班牙语和 38 名母语为德语的小学四年级学生为被试,用他们的一篇同题英语作文为研究材料,将其中的词汇错误区分为拼写错误(spelling errors)和词语选择错误(word choice errors)两类。词语选择错误又分为两个次类,一是误选目

的语词,一是直接选用母语词或易于识别的英语化了的母语词。该文从量和质两个方面对两组被试的英语词汇错误进行了定量分析和对比,试图探明两个问题:其一,德语学生和西语学生的英语词汇错误是否有显著的数量差异?其二,德语学生和西语学生的英语词汇错误是否有质的差异?也就是说,词汇错误的类型是否不同?统计数据显示,两组被试产生的词汇错误在数量上差异显著,德语学生的词汇错误量是西语学生的3倍(德语学生平均每5.76词中出现一个错误,而西语学生平均每16.42词中出现一个错误);而两组被试的词汇错误类型没有差异,都是拼写错误多于词语选择错误,且二者的比重也非常接近。具体数据如下:

	西语学生	德语学生
拼写错误	466 / 72.93%	323 / 67.43%
词语选择错误	173 / 27.07%	156 / 32.56%

该文通过比较不同母语者英语写作中的词汇错误,发现了一些母语迁移的作用,比如,德语学生的词汇错误明显多于西语学生,主要是由于“目的语和母语之间相近的语义关系使德语学生有更多的母语迁移机会,因而导致了拼写错误的产生”。这验证了以往研究的有关结论,即“母语迁移只发生在那些一语和二语结构相似的地方”。但是,从总体上来看,该文对母语迁移的规律和作用力并没有太多的发现,作者们也没有回避这一点,作者承认,“虽然语义干扰作用是明显存在的,然而基于这些结果,仍不能精确判定这些词汇错误在多大程度上与迁移相关。”Agustín Llach et al. (2005)在词汇错误探因方面之所以没有太大进展,主要是由于研究视角过于宏观。即,只对两大错误类型进行了数量对比,缺乏基于具体的错误实例所做的对比分析。

为进一步探明不同母语的学习者目的语词汇错误的分布特征及其成因,本研究选取“在交际过程中对信息意义影响最大的语义混淆”(Agustín Llach, 2011:111)为研究对象,对母语为英、日、韩、蒙古、印尼语的汉语学习者的词语混淆现象进行比较研究。尽管在比较研究这一总体思路上,本研究与 Agustín Llach et al. (2005)是相通的,但比较的层面和内容却颇不相同。概括地说,本研究不采用仅对不同类别的错误进行数量对比的宏观视角,而是改用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结合的

研究视角。即,由不同学习群体具体的易混淆词的异同对比,到不同学习群体共通性和特异性易混淆词分布特征的分析概括,再到基于易混淆词分布特征的错误探因,尝试走一条从微观分析到宏观分析的研究路线。

1.2 研究目标

本研究微观分析的目标是:

1) 以特定的词对或词群为考察单位,对比分析其在母语为英、日、韩、蒙古、印尼语的学习者的汉语中介语语料中的混淆度、错误替代的词际关系、误用方向、搭配关系及用法等误用特征。

2) 对于单一(或少数)母语背景学习者普遍混淆的特异性易混淆词,或者虽是多种母语背景学习者普遍混淆,但在个别学习群体的汉语表达中有特异表现的共通性易混淆词,则可通过汉外词汇对比来分析其母语影响因素。

宏观分析的目标是:

1) 将多种母语背景学习者普遍混淆的共通性易混淆词加以汇集,从词语的意义、词语的形式(lexical form)、词语的语法类别等方面观察其分布特征,分析词语混淆的目的语影响因素及其作用力。

2) 将不同学习群体特异性易混淆词的母语影响因素分别加以汇集,分析各母语影响因素的作用力。

二 研究材料与步骤

2.1 研究材料

Agustín Llach et al. (2005)之所以缺乏基于具体的错误实例所做的对比分析,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研究材料过少,词汇错误的数据稀疏。以西语学生和德语学生两类词语选择错误来说,其总量分别只有173、156例,如果要观察其中与词语混淆有关的目的语词误选,误例当会更少(作者没有明确交待),不可能发现哪些是两个学习群体的共通性易混淆词,哪些是单一群体的特异性易混淆词。因此,为获取充分的词汇错误实例,本研究在目前的条件下,暂且放弃对汉语中介语语料同质性的理想追求,主要依托两个大规模汉语中介语语料库,一是北京语言大学“汉

语中介语语料库”(200万字),一是北京语言大学“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424万字)。由于这两个语料库中蒙古语者、印尼语者和英语者的汉语语料偏少,项目组又补充了3种语料:1)印度尼西亚玛拉拿达基督教大学萧频博士在印尼收集的汉语中介语语料(46.5万字);2)蒙古乌兰巴托大学萨仁其其格博士在蒙古国收集的汉语中介语语料(33.4万字);3)哈佛大学冯胜利教授惠赠的哈佛大学北京书院学生的作文语料(65万字)。此外,个别子研究还用到了研究者自行采集的汉语中介语语料和鲁东大学“国别化(韩国)中介语语料库”、暨南大学“留学生汉语中介语语料库”中的部分语料。

2.2 研究步骤

在对英语者、日语者、韩语者、蒙古语者和印尼语者这5个学习群体汉语中介语语料中的易混淆词分布特征进行对比分析的过程中,本研究大体遵循如下步骤:

2.2.1 初步收集易混淆词对或词群

本研究根据学习群体的母语背景分为5个子项目,各子项目组向熟悉该特定学习群体的汉语教师 and 该母语背景的外籍博士、硕士研究生征集该母语背景学习者普遍混淆的词对或词群。

2.2.2 确定易混淆词对或词群

确定易混淆词对或词群主要依凭相关词语的混淆度。具体做法是,将各子项目组提供的易混淆词对或词群中的每一个词,同时在5种语料中分别检索,提取出含有该词的所有语句,从中筛查出当用他词而误用该词的语句,统计该词误代他词的次数,并将混淆双方(或多方)误用的次数予以加合。一般来说,在韩、日学生的汉语语料中,一对混淆词语累计误用次数如果达到8次以上、且分布于3个以上文本之中,就可确定其为易混淆词。(参见徐雷方,2010)其他几个学习群体的语料量相对较少,这个数据标准会有所下调;而且,我们还适当参考其混用次数在词语使用总频次中所占的比重。如果该词在语料库中为高频词,则要适当提高误用次数的标准;反之,如果该词在语料库中为低频词,则要适当降低误用次数标准。这道工序既可用于验证子项目组初步提出的易混淆词对或词群是否属实,还可以进一步检测其他母语背景学习者是否存在同类混淆。例如,在初步收集易混淆词时,只有英语组和蒙古语组提供了“气候-天气”。然而,语料检索及混用误例筛查数据见表1:

表 1 “气候-天气”混用的数量分布(比重:%)

	气候			天气			合计	
	总词次	混误*	比重	总词次	混误	比重	混用次数	平均比重**
英语者	11	1	9.09	86	0	0	1	1.03
日语者	96	17	17.71	217	6	2.76	23	7.35
韩语者	89	4	4.49	328	4	1.22	8	1.92
蒙古语者	18	9	50	166	8	4.82	17	9.24
印尼语者	19	3	15.79	14	2	14.29	5	15.15

* “混误”指与混淆相关的误用；

** “平均比重”指二词混用次数之和在二词总词次之和中所占的比重。

从混用比重看,印尼语背景学习者“气候-天气”的混淆程度最高,其次是蒙古语、日语、韩语背景学习者,据此,我们确定“气候-天气”是印尼语、蒙古语、日语、韩语背景学习者的共通性易混淆词;而英语背景学习者的汉语语料中只有 1 个当用“天气”而误用“气候”的误例,这属于偶发性词语误用,因此,尽管英语组先前提提供了“气候-天气”这一易混淆词对,经语料库误例筛查则予以删除;反之,将其补入印尼语、日语、韩语背景学习者的易混淆词表中。

在易混淆词检索的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一些各子项目组都没有提供,而事实上为易混淆的词对。例如,当用“运动”而误用“活动”的有 10 例(英 2、日 6、韩 2),当用“活动”而误用“运动”的有 26 例(英 9、日 9、韩 8),因此,“活动-运动”被判定为英语、日语、韩语背景学习者的共通性易混淆词。

2.2.3 分析易混淆词的误用特征

分别在 5 个学习群体的汉语语料中,从下列角度观察易混淆词的误用特征。

1) 词际关系

在特定母语背景学习者的汉语语料中,观察词语的混淆是属于一对一混淆、一对多混淆、多对一混淆还是多对多混淆。例如,印尼学生常在当用“假期”时误用“放假”(“我下定决心把这一次的放假花在毕业论文上面”),“假期-放假”就是一对一混淆。一对多混淆是指一个误用词对两个(或多个)当用词的混淆。例如,蒙古学生常用“多”误代“长”或“大”(“我的故乡有很多历史”“她比我多六岁”),“多-长-大”就是一对多混淆。多对一混淆是指两个(或多个)误用词对一个当用词的混淆。例如,日韩学生常用“旁边”或“身旁”误代“身边”(“一般的情况下孩子从出生到长大一直在父母旁边生活”“七年前,我离开了父母身旁”),“旁边-身旁-身边”就是多对一混淆。多对多混淆是指多个词语交相误代。例如,韩国学生在当用“变”时常误用“变化”“改变”,当用“变化”时常误用“变”“改变”,当用“改变”时又常误用“变”“变化”,“变-变化-改变”就是多对多混淆。

2) 误用方向

在特定母语背景学习者的汉语语料中,观察词语混淆表现为单向误用,还是双向误用。例如,在英语背景学习者的汉语语料中,“最后”“终于”的混淆是单向的,都是在当用“最后”时误用了“终于”;而“能”“会”的混淆是双向的,既有不少当用“能”而用“会”的误例,也有不少当用“会”而误用“能”的情况。

对于双向误用,还要进一步看哪个词的误用更为常见,如“完”与“结束”的混淆,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为当用“结束”而误用“完”,当用“完”而误用“结束”则非常罕见(详见张博,2013)。

3) 搭配关系及用法

在特定母语背景学习者的汉语语料中,观察与混淆相关的词语误用是在哪些搭配关系下误用的,在用法上有何错误,哪种(或哪些)错误最为凸显。例如,在日本学生的汉语语料中,当用“严重”而误用“重大”的有42例,当用“重大”而误用“严重”的有37例。这对易混淆词的误用在搭配关系及用法上的分布情况见下表:(→指向当用词)

易混淆词	混用总数	搭配关系及用法		偏误数	比重(%)
重大→严重	42	搭配语义类	疾病/伤	6	14
			后果	9	21
		语法功能	充当状语	16	38
			带补语	5	12
		构成抽象名词	重大性	6	14
严重→重大	37	决定		1	3
		意义		1	3
		变化		2	6
		影响力		3	8
		疾病		14	38
		问题		16	43

(引自曹雪林,2012)

从表中可以看出,“严重”“重大”混淆所导致的误用在搭配关系及用法上最显著的分布特征有两点:一是“严重”与“问题”的不当搭配,例如:

我国将要怎样发展下去,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二是“重大”误用来充当状语,例如:

没有通过考试重大打击了我学习的信心。

2.2.4 对比共通性易混淆词的分布特征

将不同语料范围内的易混淆词在词际关系、误用方向、搭配关系及用法等方面的分布特征进行对比,分析共通性易混淆词分布特征有哪些相同点,哪些不同点。比如,将英语背景学习者“最后”“终于”的误用方向与日本学生、韩国学生这两个词的误用方向进行比较,发现三类学习者混淆“最后”“终于”所表现出来的误用方向是一致的,即,未见当用“终于”而误用“最后”的,都是在当用“最后”时误用了“终于”,例如:

幸而在小吃店里有一位巡警使他们镇静下来,否则他们就会大打出手,终于我们很生气甚至走得如此匆忙,什么话都没说就走了。
[英语背景学习者,以下简称“X 语者”]

在电影上她显得非常聪明,长得眉目清秀,但是,可惜得了白血病,终于死了。[日语者]

父母对孩子过于溺爱,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的孩子只知道自己和自己的利益,利己主义终于会包围社会。[韩语者]

而“办法-方法”这对易混淆词的误用方向在不同母语背景学习者的汉语语料中却表现出不同的分布特征:

表2 “办法-方法”混用的数量分布(比重:%)

	办法			方法		
	总词次	混误	比重	总词次	混误	比重
英语者	231	4	1.73	126	1	0.79
日语者	227	21	9.25	119	0	0
韩语者	73	0	0	99	10	10
蒙古语者	24	5	20.8	24	0	0

从总体上看,“方法”“办法”的混淆在英语、日语和蒙古语背景学习者的汉语语料中,都表现为当用“方法”而误用“办法”,例如,“每个人有自己的学习办法”[蒙古语者],只有韩国学生的汉语语料中呈现出特异的误用方向,即当用“办法”而误用“方法”,例如,“路上堵车堵得太厉害了,没方法,我们只能等”。

2.2.5 分析母语影响因素

单一(或少数)学习群体特异性易混淆词当是受母语词汇知识的影响而形成的,因此,可以对特异性易混淆词与学习者母语的对应词进行意义及用法的对比分析,探求其母语影响因素。例如,印尼学生常在当用“假期”时误用“放假”,对比这两个词的印尼语对应词发现,虽然“假期”和“放假”在印尼语中有各自的对应词,“假期”对应名词 liburan,“放假”对应动词 berlibur。但是,在印尼语口语中经常有省略词缀的习惯,如,“Kamu kapan libur?”(你什么时候放假?)、“Libur sekarang kamu mau ke mana?”(你这个假期要去哪儿玩?),从而导致学习者不注意区分与 libur 对应的两个汉语词在意义和用法上的区别。(引自张瑞婷、萧频辨析的词条“放假-假期”)

多个学习群体的共通性易混淆词,如果在某一学习群体的汉语语料

中呈现出特异性分布特征,也应当进行母语影响因素分析。例如,共通性易混淆词“方法-办法”在韩国学生的汉语语料中呈现出特异的误用方向,总是在当用“办法”时误用“方法”,经汉韩对比分析发现,其原因在于韩语汉字词“方法”对应于汉语“办法”和“方法”两个词。(参见申旼京,2011)

在逐一分析每一对(组)易混淆词的基础上,将特定学习群体易混淆词的母语影响因素予以归纳,分析其作用力的大小强弱。

2.2.6 分析目的语影响因素

将多种母语背景学习者普遍混淆的共通性易混淆词加以汇集,从混淆词语的语义关系、语素的同一性、词语的语法类别等方面观察其分布特征,据此分析词语混淆的目的语影响因素及其作用力。

三 主要内容及作者

3.1 主要内容

全书分为四章:

第一章:理论与方法研究

长期以来,对外汉语教学领域的词语辨析基本上是在同义词研究框架下进行的,为了实现从汉语同/近义词研究向汉语中介语易混淆词研究的视角转移,本章首先以汉语同义词研究为参照,从理论上明确易混淆词研究的基本取向,探讨易混淆词的分类和特征;然后尝试提出汉语中介语易混淆词判定标准及混淆度分析方法,并对学习者语料库在混淆词语研究中的效用进行评估;最后针对二语学习者词语混淆最重要的母语影响因素“词义误推”进行探讨,将词义误推概括为义位误推、义域误推和语义特征误推三种类型,提炼出二语学习者“词义误推”的主要特征。

第二章:CSL学习者共通性词语混淆分布特征及其成因研究

本章从名物范畴、动作行为范畴、性状范畴和虚词中选择一些不同母语背景学习者普遍混淆的词聚或词群,从词际关系、混淆程度、误用方向、混淆条件等方面对比分析这些词聚或词群的混淆分布特征,力求从汉语角度探明5大学习群体普遍性词语混淆的目的语影响因素及其作用力(如词义、词频、词形、词语结构等),从汉外对比的角度分析解释某种(或某些)母语背景学习者较为凸显的特异性词语混淆表现。此外,本章还基